

區主任

雷汀著



新文藝出版社

8
2

四

士任



藏于图书馆



雷汀
区主任

內 容 提 要

本書包括六個短篇：『錄幣』是寫抗日戰爭初期，一羣鐵路工人如何走向不同的抗日鬥爭崗位，並反映了當時國民黨政府開始迫害人民抗日活動的情況。『老房東』是通過一個有着兩個兒子參加了革命部隊的老太太對我軍幹部的熱愛，反映了解放區軍民之間的血肉關係。『區主任』及『臘月歲』都是描寫解放戰爭即將全面開始時，在國民黨統治區和解放區交界處已開始了武裝磨擦的情況。『社火頭姚文睿』是反映農民翻身後迫切歡迎有新內容的文娛活動的情況。『船渡』是描寫解放戰爭中我軍兩個偵察戰士在爭奪黃河兩岸的作戰過程中所表現的英勇和機智。

區 主 任

著 者 雷 汀
出 版 者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壹號
(上海康平路 155 號)
印 刷 者 永 立 印 刷 所
(上海新開路 920 弄 50 支弄 22 號)
總 經 售 新 華 書 店 上 海 發 行 所

書號 (808) [I II 130] 類別 文學一小說
字數 40000 字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2 1/4
1955年6月上海第1版——第1次印刷 1—10600 冊

定價 二角一分

目 次

錦幣	一
老房東	10
區主任	三
社火頭姚文睿	四
臘月底	五
船渡	六〇

鎳幣

——憶一個誠實的平凡的工人

那還是抗日戰爭開始時的故事。

那時候，我在京滬鐵路上工作。日本鬼子佔領了南京後，我就隨着鐵路上的員工，經過津浦路，隴海路，平漢路撤退到了武漢。鐵路上絕大多數的員工也都陸續地到了武漢。都在等候着當時國民黨交通部的發落——分配到別的鐵路或別部門去工作。大家都認為現在是抗日時期，正是國家用人的時候，對於我們這批鐵路上的技術人員，國家當然是不會置之不理的。

有幾個比較熱心和年青的人，商量着把所有在武漢的鐵路員工組織起來，一方面可以有組織地推派代表向國民黨交通部當局交涉善後的事情，這樣也許可以快一些解決問題。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這個空閒的時間，在武漢做些抗日救亡工作，不要使前方將士用血肉換來的日子白白地消磨過去。

經過幾天的奔走，聯絡，很快地我們的組織便成立起來了：「京滬滬杭甬鐵路流亡員工

抗日服務團

所有撤退到武漢的二千多個員工，都在這個旗幟下組織了起來，我們把願意參加救亡工作的人組成了幾個小小的宣傳隊，輪流着在武漢各處貼標語，發傳單，講演，到傷兵醫院去慰勞傷兵，或者到難民收容所去慰問難民，進行一些募捐衣服之類的工作。因為我們都是工人，因此，不像其他救亡團體，我們既不會演戲，也不會唱歌，但我們的誠實樸素的出自內心的話句，往往會使對方感到親切因而深深地感動，我們也常常為這些真切的反應所鼓舞而更加熱心地工作。

我也參加了這個工作，擔任着第八宣傳小隊的隊長。隊員的成份是很複雜的，一共有九個人：一個查票員，兩個車僮，兩個揚旗手，兩個修車工，一個機匠，和一個司機。

在這九個人中，使我最感興趣的是那個司機張福林。他是個異樣沉默的老工人，很少說話，好像多說了話是會犯法似的，就是偶而扯談起來，也只是三言兩語，然後又默默地去做他自己的事情了。

我遇見過各種各樣的工人，但大多是些直爽，明快，喜歡胡扯談的傢伙，他們碰在一塊兒，喝上四兩或者半斤燒酒，剝着幾個銅子的花生或者油炒豆，大聲地猜着拳，用毫不拘束的放縱的語句海闊天空地述說着各種各樣的事情，往往一點點有趣的事情可以使他們天真地

大笑好半天。間或也會爲了一些小警扭互相鬧得面紅耳赤起來，但過後，又會得像什麼事也沒有發生過似的混在一起了。就是碰到有些什麼不痛快的事情時，他們也往往在一起一口口地喝着悶酒，用低沉的語調，唉聲嘆氣地慢慢地互相述說着過往的痛苦的經歷，感慨着沉重的生活負擔，抽着一個銅子一根的「小仙女」香煙，然後互相拍拍肩膀沉默地散去。或者乾脆幾個人面對面地默默地坐上幾個鐘頭，好像坐在一起就會輕鬆一些似的。

張福林却是完全兩樣的人，在他身上好像有樣什麼特殊的東西壓着似的，使人摸不着也猜不透。他老是孤獨地一個人來來往往，不和別人說一句話。當別人有說有笑的時候，他總是不聲不響地做他的事情，好像別人的談笑不會在他身上引起任何反應一樣。時間久了，他會皺着眉頭，顯得很不耐煩的樣子走開去，和他在一起，你可以一整天不開口。

起先，我以爲他是由於初來，不習慣於工作或和大家不熟悉，時間久後，自然會好起來的。但他却老是那樣，於是有一天當大家正在有說有笑的時候，我試着想問問他：

「老張！爲什麼老是不說話呀！」

「唔！」他把正在疊着的紙放了放，應了一聲，然後呆呆地望了我一會，好久不說話，又去繼續他的工作。

「是不是有什麼心事？」

「沒有，先生！」他回答。他老是叫我做先生，我已經對他說了好幾次了，要他像其他人似的叫我老王，但他却老是改不過來。

於是，沉默着，我們的談話便中止了。同這樣的人在一起談話，連我平素最喜歡扯談的人也毫無辦法。

關於他的歷史，我知道得不很詳細，只根據和他熟悉的工人說，他父親是個碼頭上的搬運工人，遠在北伐戰爭時候，因為參加罷工，給英國巡捕在上海南京路上用槍打死的。母親是個紗廠的粗紗工，父親死後，為生活所逼迫，再加上生氣，得了神經病，不久也死了。而他從十三歲起就在鐵路上工作，一直做了二十三年，一個大字也不認得，從打石子的小工，好不容易才慢慢地經過擦車，小燒，而升到了司機。

但他對於工作却是比誰都熱心和積極，從來沒有一天請過假，或者遲來過，從他的面上也沒有一次使人感到對工作有什麼不滿意的表示。他每天總是第一個來，打漿糊，整理標語，把傳單裁開疊好……等到出發的時候，他已經什麼都弄得妥妥貼貼的了。然後，提着漿糊桶跟大家出發。他和機匠老吳經常擔任貼標語的工作，他是個矮小的人，提着那隻長長的漿糊桶，常常會使人擔心那隻桶會碰着地。他搖晃着身子跟在老吳後面，老吳叫他在哪裏抹漿糊，他便一聲不響地抹起來，然後便幫助老吳貼上去，貼好後，他總要仔細地看一會，有沒

有什麼地方不平或不正，然後才鬆口氣走開去。晚上，回來的時候，便忙着洗漿糊桶，裁標語紙，擦桌子，磨墨……往往又是他最後一個回去，有時候，他還會突然回來，把一把剪刀或者墨之類的什麼放妥當了再走。

因為他工作得很好，所以時間久了，我們也就不再注意他，也許我們對他也處得習慣了。

這樣，我們工作了有一個多月，漸漸地國民黨當局注意起我們來了。國民黨公安局的便衣常來我們團部了解些什麼，問東問西的；戰區司令部派人來把幾個積極的領導人叫了去，說抗日是很好，政府很歡迎，但無必要組織什麼團體，要注意不要受人利用了。過了幾天，國民黨交通部也像突然有了辦法似的，每人發了一點微小的旅費下令遣散，各找自己的出路。而且立刻把幾個領導人調了工作，有的派到浙贛路，有的到粵漢路。而我也接到通知，要我到重慶公路局。但我憤憤地拒絕了這個調動，仍然留在武漢，並且向交通部提出了意見，要求更妥當地處理這些工人，這種採取撒手不管的作法是不對的。

服務團的工作，當然便無形停頓了，工人們也很少到團部來。只有張福林還是照例時常來，一進門，就陰沉着臉說：「先生！有什麼事要做嗎？」

好像我是什麼工頭似的。

「沒有，現在還在交涉中。」我只得這樣回答。

「我想……」他喃喃地咬唔着。

「待幾天總會有辦法的。」我這樣安慰他。

於是他也默默地站了一會，或者幫我做些什麼事情，便又一聲不響地走了，把門輕輕地不出聲地關上。

工人們沒有了領導的人，而且眼看着已經沒有了希望，便惶亂起來，起初大家還互相觀望着，後來便都悄悄地陸續離開了武漢。

但張福林却仍舊常常來，每次來時，他總是用單調的很少的話句，毫無表情的告訴我那些人回到上海去了，那些人去當了兵，那些人考進了什麼訓練班，那些人做了小販，那些人……好像他是我的什麼偵探似的。我討厭着這些消息，但他却老是帶來。

可是，關於他自己將如何，却沒有一次肯定地表示過。有一次我問他：

「老張！你打算怎樣？」

「沒什麼打算，先生！」

「回上海不？」

「決不定。……」

我也沒有再追問下去。

最後，我也準備離開武漢，到西北去。但我沒有對一個朋友或工人談過。只對房東太太模模糊糊地露了一下。

那夜，天氣特別寒冷，我提着我的小皮箱，扛着小小的鋪蓋捲，一個人到了大智門車站。在候車室裏望着來來往往的客人，自己感到異樣的寂寞，默默地有淚水在眼睛裏滾動，氣管裏像有什麼東西塞住似的不痛快。想到政府不積極地發動人民，支持人民的抗戰熱忱，感到非常氣憤，但想到自己能有機會去西北，則又興奮起來。

突然，我發現張福林一個人擠進候車室裏來，在人羣中張望了好一會，然後跑到我面前來，緊緊地握着我的手，然後慢慢地說：

「我來送送你……」他笑着，我第一次在他臉上發現這種興奮的笑容。然後他解釋道：「我到你住處去過，那個房東告訴我的。」

我握着他的粗笨的手，感動得說不出話來。但我不明白他為什麼這樣晚了還上我的住處去，他從來沒有在晚上去過。

我們沉默着。一會兒，我看見他又陰沉着臉了。

「我……」他喃喃着，從口袋裏掏出一封信來塞給我。

那是一封他家裏給他的信，叫他回去，家裏的老婆和三個孩子，都張着口在等他回去找

飯餵他們。

「沒有辦法，這已是第三次了。」他沉重地嘆着氣。

「唔！」這次却臨到我不說話了，我有什麼話來安慰他呢？我又解決不了這些困難。

「明天，我也要走了，回上海去。」半晌，他慢慢說。

「你不要……」我沒有說下去，我知道我的話幫助不了他，所以就只好沉默着。

「先生，回上海後，我拉黃包車去，我是不會回鐵路上去替日本人做事的。……」他猜着了我的沉默的意思，便這樣堅決地說。

「唔！好的。」我不大相信他的話，一個鐵路上的技術工人，去拉黃包車，是可能的嗎？所以只隨便應了一句。

「先生！只要在這裏有一點辦法，能用得出力的地方，我是決不回去的。」他又解釋了一句。

然後，我們都沉默着，讓時間慢慢地溜過去。

他送我上車後，倚在車窗上對我說：

「聽說西北很冷，你應該保重身體。」他變得很會說話了。

「唔！」這回却是我變得說不來話了。

「你是識字的，常寫信來。」

「唔！」我應着。

「聽說有很多識字的都去西北了。」

「唔！」……

車子要開了，站長已經揚起了綠旗，火車頭怪聲怪氣地叫起來。他像突然想起了什麼似的，從口袋裏摸出五個兩毫的鎳幣來，塞在我的手中。

「我還有這幾個錢，你帶着，這去西北路很遠，也許路上會有些用處的。」

我呆了一呆，來不及還給他，車子開了，我看見他很快地消失在人羣中。

半晌，我才回頭望着躺在我手中的幾個雪亮的鎳幣，還帶着一股熱氣，自己感到一陣溫暖浸透了我的全身，再也禁不住我的淚珠淌下來了。……

幾年來，我在延安，在敵人後方，在戰場上，把什麼東西都丟掉了，但這幾個鎳幣却一直跟着我，每一次當我翻弄着它們的時候，總使我更增加些勇氣和熱力，同時，張福林的平凡的誠實的臉孔，又一次地在我的腦海中清晰地顯出來。

祝福他也像我一樣健康地走着充滿了光明的鬥爭的道路。

一九四五年四月

老 房 東

那是兩年前的事情。

我在晉綏邊區做通信工作，一個人在黃土的山叢和急湍的山溪中來回地奔走着，從這一個部隊到那一個部隊，從這一個機關到那一個機關。

十月初，我到了交通局，那裏有着許多關於敵偽方面消息的報紙和材料，交通局的負責人及大部分工作人員，都是一些熱情的年青同志。我得到了領導上的同意，便在交通局裏暫時住了下來，預備做一個短時期專門報導敵人方面情況的工作。

他們把我安置在一間相當精緻的窑房裏，這是完全用石頭砌成的，門窗上及窑內兩壁上還稀稀落落地刻畫着一些花紋，龍呀鳳的，窑的後壁模模糊糊地看出來畫着一張八仙過海圖，那個劉海的金錢還相當清晰。房正中掛着一盞紅布做的燈籠，放着一張紅木的四方桌子，有着一對靠背上刻有「東」字的太師椅。……這是一間頗有些古色古香的窑房。這個院子一共有五間窑房，住着三家人家，雖也都是石頭砌的，但都沒有這間窑房的那派氣勢。雖

然這許多陳設都是灰樸樸的顯得已經陳舊了，而且那股衝鼻的霉酸氣味，使人感到這窑房已有好久沒有人住了，但從這裏仍可以想像出，在這一帶的山溝溝裏，住着這樣一眼窑，這房主人的身世是不錯的，大概不是個地主，也是在地面上幹着什麼官兒的老財，或者兩者都是。

房主人可就在右隔壁的那眼窑裏，所以我可以時常去玩。房主人的家裏除了三個三十六歲的媳婦外，只剩下一個五六十歲的老太婆了，而且還是患着風濕病的。第一天，我一住下就過去拜訪我的房主人，那窑房裏黑漠漠的有股這一帶老百姓家裏所共有的酸菜味道，她坐在炕上，看不清楚穿的是什麼衣服，只感到還整齊。窑裏面除了些吃食傢具、幾隻衣櫃和種莊稼的鍛頭鋤頭之類東西外，幾乎就沒有什麼其他的東西，她媳婦也正回娘家去了。

一見面，說了幾句應酬話後，她便抖顫顫地伸出兩隻佈滿了皺紋的瘦得只是皮包骨的手給我看：

「同志！你看，這個手就癢個不停，每個關節彎裏都癢得抗不住，腳指節，腿關節彎裏也癢，……癢個不停，白天啥事都做得做不成，晚上癢得睡不成覺，……先生！你看看，看看，有啥法治治，唔！這是種啥病，你說還能好不？……看看……」

於是她把身體更靠近我一些，使我聞到一股老年人所特有的氣味。她的兩隻眼睛眨呀眨的看着我。於是我只得去看一看她的手。她的手在微微地顫抖着，整個的手皮都很厲害

地皺着，長滿了老繭，這是一雙經歷了長年累月的艱苦勞動的手，我想起了我住的那眼窯房，和這雙手是很不相稱的。

「看看……有啥法治治？……」

我看不出到底是什麼病，而我又不是個醫生，因此就隨便應了一句：

「有法治的，改天我去弄些藥來試試看。」

於是，她望着我，和藹地笑了，露出一排沒有了牙齒的牙床。

「那多好！同志！該會好的吧？真是活受罪，我實情想多活幾年呀！看這日子有多好。唉……」

然後，我便開始問她的出身，問她的過去的生活，問她這房子是在什麼時候造的，什麼人手裏造的。……

但是，她好像不太願意去多講關於她家的一切詳細情形似的，大概一扯到過去，就怕引起很多不必要的痛苦的回憶。因此，她只是用一種很平常的語調，像述說旁人的事似的簡單地說着。她姓張，祖代幾輩都是房無一間，地無一塊的窮莊稼漢。造這幾間窯房的是遠在她的公公手裏。那時候，她公公還年輕，才到這混名叫一條龍的老財東家裏扛活，就因為造中間那眼窯，不注意踏破了四塊從太原府運回來的什麼洋玻璃，被一條龍算了一身賬，替他